

中 华 文 史 新 刊

金元诗文与文献研究



王
树
林
著

本书包括金元文学家的创作论、文风的发展嬗变以及对金元诗文的深入考证。作者对所涉金元文献皆溯流探源，辨伪存真，辑佚补缺。时出新见，多有创获。不仅勾勒出金元文学史的发展脉络，而且阐明了金元诗文的文学、文化价值。

中 华 书 局

中 华 文 史 新 刊

金元诗文与文献研究

王树林 著



中華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元诗文与文献研究/王树林著. —北京:中华书局,
2008.11

(中华文史新刊)

ISBN 978-7-101-06237-3

I. 金… II. 王… III. ①古典诗歌—文学研究—中国—辽宋金元时代②古典散文—文学研究—中国—辽宋金元时代 IV. I209.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10440 号

书 名 金元诗文与文献研究

著 者 王树林

丛 书 名 中华文史新刊

责任编辑 焦雅君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版 次 2008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630×960 毫米 1/16

印张 19½ 插页 2 字数 260 千字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06237-3

定 价 42.00 元

序一

邓绍基

去年冬日，王树林学人赐寄著作《金元诗文与文献研究》（打印稿），问序于我；转瞬新年履端，1月3日，他致我电子邮件，辱蒙贺岁，并再次嘱我写序。为了不辜负树林学人的盛情雅意，我不辞简陋，抒写若干感言，权作序文，敬请作者和读者指正。

树林学人长期执教于高校，长于古文献学研究，多有论著，卓有成就。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他与我常有联系，也不时有短暂相聚、交谈的机会，如2004年我们连续在穗、港两地参加有关辽金元文化的学术研讨会，无论会场内外，多有交谈，旅中难免辛劳，多承他关照，至今记忆犹深。他的专心致志、乐此不疲的敬业态度，他的攻苦食淡、磨穿铁砚的钻研精神，更给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近十年来，他更多地金元文学研究领域辛勤耕耘，这部著作是他近十年来研究成绩的部分反映。

上个世纪90年代初，金代文学研究专家、时任《社会科学战线》主编的周惠泉先生的《金代文学发凡》行将付印出版之际，嘱我写序，我在序文中说：我对金代文学缺乏研究，但我参与编写《元代文学史》时，深感金元文学之间有密切的关联，如果不深切了解金代文学，就很难贴切地说明元代文学的若干重要现象。即以散文来说，为了清理元代散文发展的线索和特点，必须上溯到金文，注意和发现它们之间的传承影响的轨迹。我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主编《元代文学史》时，注意到金代文坛出现过宗唐和宗宋文的不同倾向，金室南迁后出现的雷渊和王若虚论文的对立，即为有代表性的例子。此外，还出现了要跨越唐、宋，直追先秦散文的主张，其代表人物是雷渊的老师李纯甫。刘祁《归潜志》记李纯甫“为文法庄周、左氏，故其词雄奇简古”，“后进宗之，文风为之一变”。受金代散文家宗唐和复古观点的影响，元初北方散文

家中最著名的姚燧和卢挚以及稍后的元明善,在不同程度上也都具有这种倾向。姚燧曾自言他学文是从韩愈文开始的,他的一部分文章有雄刚古邃之风。对他的这类文章,当时有“读而能句,句而得其意者,犹寡”的说法。但姚燧并没有轻视宋文的言论。卢挚则不同,他认为宋文章家中古作甚不多见。他还认为,韩、柳虽为大家,“然古文亦有数”,所以他要直追先秦古作。元明善为文主张“若雷霆之震惊,鬼神之灵变”,《元史》记他“早以文章自豪,出入秦、汉间,晚益精谐”。很明显,姚燧和卢挚的古文见解与实践接近于金代的李纯甫。金代还有一位文章家赵秉文倒是宗宋文的,他是南渡前后的文坛盟主,他在当时的实际影响超过了李纯甫。

在研究元诗的发展时,我也注意到元代宗唐风气可以上溯到宋、金。元末明初人瞿佑的《归田诗话》说元代诗坛“举世宗唐恐不公”,我发现,实际上元代“举世宗唐”的局面是由两股潮流合力形成的。金代后期诗人宗唐,南宋末年诗人也开始宗唐,但两者之间还是有区别。宋末元初如戴表元、仇远、白珽等人的宗唐(仇远说“近体吾主唐,古代吾主《选》”),从其言论及创作来看,尚未有所谓初唐、盛唐、中唐之分,因此诗歌创作上也呈现各种风姿;而金代诗人如元好问等则主要推崇盛唐,重豪迈,崇清壮,有关金代宗唐的起源问题,我认为基本上是从赵秉文开始的。赵秉文的老师王庭筠推崇宋代苏轼、黄庭坚,而赵秉文后来改弦更张,主张学习唐诗。我们知道,中国文化传统讲究师承家法,不能越雷池一步,赵秉文此举因此被人视作与老师争名。赵秉文改变门庭,改崇宋为宗唐,这是传统师承家法上的一个叛逆,也是金代诗风的重大转变。以上说明,为了研究元代诗歌的发展,我们必须上溯到金代文学。

树林学人在《金末文风嬗变与元好问的散文审美理论》一文中对金末文风嬗变的论述比较充分,由于所据材料大致相同,他和我有类似看法,但他的细致之处却对我很有启发,特别是他对元好问古文主张的阐述更显全面,他指出元好问固然推崇他的老师赵秉文,但实际上他既纳赵秉文为文之创新方法,也取李纯甫为文之创新精神,也可以说,他总结了南渡后各家文章之长,融汇变通,实际上是独标“唐宋文派”。我认为树林学人的这个见解是符合实际的,同元好问的诗歌见解正相合榫。金代诗坛原本主要受宋代苏轼、黄庭坚的影响,也就是以承继宋诗为主要特征,南渡后发生明显变化,出现宗唐的倾向,其

主要代表人物也是赵秉文,刘祁《归潜志》中说:“赵闲闲(按:即赵秉文)晚年,诗多法唐人李、杜诸公。”又说:“已而麻知几、李长源、元裕之辈鼎出,故后进作诗者争以唐人为法也。”元好问《杨叔能小亨集引》中又说:“贞祐南渡后,诗学大行,初亦未知适从,溪南辛敬之、淄川杨叔能以唐人为指归。”元好问自己实是融汇唐宋诗派的大家,我在《金元诗选》前言中说:“元好问是推崇唐诗,并挫笼参会唐宋诗歌名家,终为名家的人。”

所以,我想树林学人提出的元好问“独标唐宋文派”之说,确与元氏的诗歌见解相一致。我以往的有关论述中,有所忽略。但我对树林学人关于元好问“独标唐宋文派”之说也有所补充,我总觉得,元好问的主张与实践有误差,他虽然实际具有“唐宋文派”的主张,但从他的诗歌实践看,受盛唐诗歌影响比较明显,而从他的文章实践来看,或许更近宋文路数。

王树林学人的《程钜夫江南求贤与元初南北文风融合》一文对我也有启发,我在有关论述中大抵把元代南北文风汇合的起始定在赵孟頫和袁桷先后进京那个时段内,树林也说:“为南北文风融合做出较大贡献的首先要提到赵孟頫”,而赵孟頫进京正是程钜夫江南求贤的成果之一,所以树林重视程钜夫的作为,这样也就不仅把江南求贤看作是一个著名的政治事件,同时也是一个影响文风整合的重要文化事件。这是一个重要的识见。此外,树林学人很重视程钜夫作为在南宋临亡之际即进入北朝的南方文人与那些北方名士交往的情形,他说到的翰林和文史清要之官有“四王”,即王磐、王构、王恂和王恽,还有阎复,其中王磐是金代进士,堪称元老,他与程钜夫关系甚善。王恂是忽必烈之子、太子真金的老师,真金周围有不少文学之士,他们对真金的影响较大。这些北方名士与蒙古时期的东平府学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也就与元好问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有关,元好问曾在东平主持过地方性的科举考试。我尝思考,如果没有元世祖忽必烈对南士的重视,如果没有元仁宗力主实行科举取士,包括文风在内的南北文化的整合或许会呈现另一种历史面貌。而程钜夫先是执行元世祖的政策,后来在元仁宗实行科举过程中,他也积极行事,起过重要作用。所以,论说南北文风整合确实应当提及程钜夫的作为。树林学人重视程钜夫,足见其识见之周全。

树林学人很重视文士之间友谊交往的文化意义,他在《马祖常散

文的文化成因及审美特质》一文中把马祖常的广泛的人际交往与接受文坛风气联系起来考察,其间说到南士袁桷、虞集和贡奎等,北士王士熙、曹子贞和许有壬等,都是马祖常的文章好友。他们学问淬砺,诗文切磋,实际上也有助于南北文风的进一步交流与融合。当然,马祖常活动年代已在延祐以后,那时他的师长姚燧已经去世。《元史·姚燧传》记姚燧“轻视赵孟頫、元明善辈”,树林学人对此类记载持又信又不信态度,我也持此态度。本来,文人相轻,自古已然,但这并不妨害全局意义上的南北文士的交流以及与这种交流密切相关的南北文风的融合。而且,相反的实例也不少,我在《元代文学史》中曾说到:虞集在大德、至大年间的京华文士中属后起之秀,南北“元老”卢摯、姚燧和程钜夫、赵孟頫曾与他同席论文,并得到这些“元老”的激赏。结合着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来考察,这不仅仅表现为一个提携后进的佳话,而且体现出重要的文化意义。

金元诗文研究领域还有很多要做的工作。由于前人的积累较少,文献资料方面仍然有不少有待解决的问题,比如文献资料校正的问题。元代诗人萨都刺的《雁门集》中就有他人作品混入,卢琦的《圭峰集》中他人诗作更多,还有编集人故意作伪现象。我的同事杨镰先生正编纂《元诗全编》,他说此类问题不少。我在杨宏道的集子里,偶然发现其中竟然有“元诗四大家”之一杨载的诗歌,还有送张雨的诗。杨宏道去世的时候张雨还在南方,未到大都,怎么会有杨宏道在大都送张雨回南方的诗呢?树林学人告诉我,杨宏道集子里混入别人的诗作不止一两首。树林学人对文献研究本属当行,他在这方面已做了大量工作,他所写的《金末诗僧性英禅师考论》、《〈文章精义〉作者考辨》和《杨奂、杨弘道等蒙元北方十家文集考略》等都是颇见工力的文章。

总之,树林学人的这本著作内容丰富,既涉创作论说,更多实证考辨,时出新见,常有创获。我尝说过,研究金元诗文,既有困难,也多机会,像树林学人这样踏实用功,孜孜以求,多有收获是意料中事,天道酬勤,事在人为,付出努力,必有回报。我衷心祝贺树林取得更大的研究业绩。

最后略谈感想。二十多年前我参与编写《元代文学史》时,深感元代诗文研究的冷落,我常常举通行的文学史著作为例,作为热门的唐宋诗歌在这些著作中有充分的论说,即使是明清诗歌,通行的文学史著作中也都有较多的论述。大学生们可以把明诗中的前、后七子以及

公安、竟陵派的兴盛衰微背得滚瓜烂熟；对清代的神韵说、格调说、肌理说和性灵说的来龙去脉，也可如数家珍般地道来。但对元代诗歌的发展，却说不出个甲乙丙丁、子丑寅卯来。因为通行的文学史著作缺乏这方面的内容，于是我不计成败利钝，总想就元代诗文的发展理出一点脉络、线索，在诗歌方面，我发现了元诗的“举世宗唐”现象，经历了唐、宋两大诗派，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现象，于是我就把这宗唐之风的始由稍稍理了一个线索，并分为前后两期。但也有人主张分期，认为元代历时不长，很难分期。这且不说，重要的是，即使把宗唐风气的来龙去脉说清楚，基本上也还属于表象，只见经络，还不是血脉。按照我当时的设想，真正研究元诗的“举世宗唐”现象，至少应该从六个方面着手：一是先要尽可能多地收集元人宗唐的种种言论、见解，研究他们在追求什么和扬弃什么；二是找出有代表性的作家，考察他们的实践；三是考察他们言论与实践的一致与差别；四是要考察元人宗唐与宋金人宗唐的联系与差别；五是从诗艺的、美学的角度作阐发；六是从中国诗歌发展意义上作评价。《元代文学史》第十七章第一节《元诗“宗唐得古”风气的形成及其特点》、第十七章第三节《元代散文发展的主要特点》都是由我执笔，相对而言，我对元代散文发展的梳理展开得不够，论述过于局促。至于金元诗文之间的关系，重要的还不只是找出它们的相似之处，也不只是为了说明它们之间有无继承、影响关系，更重要的是要研究它们的同与不同，也就是同中有异的内涵，从而有助于深入地探讨带规律性的文学现象和文学命题。譬如文学史上的种种理论和主张，大抵有前后继承、发展关系，元初以卢摅为代表的轻视唐宋古文，而主张返回先秦两汉的观点，实际上开了明代前后七子“文必秦汉”主张的先河。元末朱右编《八先生文集》，收录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和苏辙的文章，在散文方面以唐宋八家为主的主张实际上也开了明代“唐宋派”尊奉“八大家”的先声。由于元代诗人宗唐并不专宗盛唐，明代前后七子倡导复古，提出所谓“诗必盛唐”，不仅针对着宋诗，实际上又是对元诗宗唐实践的继承与发展，关于这点，几乎所有的著名文学史著作中无一论及，而论述元诗宗唐，正好凸显明人宗唐的前因后果。

总之，对金代和元代诗文还需要做更深入的发掘。包括系统论说和个案实证的发掘。我高兴地看到，有一些中青年学人在这个领域内取得不少成绩，但我希望有更多人参与进来。古人和今人编有《全金

诗》或《全辽金诗》，还有《金文最》和《全辽金文》等。现在《全元文》已经出齐，《元诗全编》也将问世，它们为金元诗文研究创造了更好的条件，有巨大的意义。我一向认为，一个学术领域的成熟和兴旺发达，应当至少有如下三个标志：首先，此一领域内文献资料的积累和整理应当具有基本的规模；其次，学术论文及论著不断出现，而且出现被学界公认的优秀著作甚至权威著作；再次，出现一批专攻或兼攻此一研究领域的学者，其中还应出现一些被学界公认的优秀学者。我看金元诗文研究的奋斗目标也大致如此。我期待着出现一个百年以来从未有过的金元两代诗文研究的繁荣局面。我也希望树林学人做出更大成绩。

2008年1月31日初稿

2008年7月15日修改稿

序二

李修生

12年前,学友树林教授到北京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做访问学者,我们有机会在一起切磋某些问题。此前,他曾校笺古代诗文作家的文集,当时我们古籍所正在编纂《全元文》,所以请他参加《全元文》的编纂工作。他先后完成五十余万字的校点工作,并参与部分审稿,还为《古本戏曲剧目提要》撰写了十余种剧目提要。他决定将今后的科研重点放在金元时期的诗文研究方面,并商定以程钜夫江南访贤与文坛文风融合作为切入点,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撰写了《程钜夫江南求贤与元初南北文风融合》、《文学家兼地理学家的元代道士朱思本》、《少林寺元代碑铭的文化价值》等文。

1996年5月,作为河南省中青年学术骨干,按要求可以聘请两位指导老师,他请了邓绍基先生和我。邓先生当时正在主编《中国十大词人精品全集》,就将元好问词的选注工作交给他来做,1998年大连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十大词人精品全集·元好问》卷及《元遗山生平与词创作探求》等文,是在邓先生的指导下完成的。

十余年来,树林教授一直坚持这一科研方向。2001年,他由商丘师院到南通大学工作,摆脱了不少行政事务,研究工作更加勤奋,做了不少元代诗文文献方面的基础研究,也写了若干篇论文。2006年,“元代散文史稿”获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立项。为做好这个课题,他对此前的研究成果做了一番清理、选择,整理起来,就是这部书稿。

本书共收入四组文章,各有偏重。

第一组文章,涉及元好问散文理论的形成,南北文风的整合和也里可温作家马祖常、元末诗人叶颙,大致勾勒了一个“史”的轮廓。元好问对开启有元一代文风至关重要,元初文坛,无不浸透着他的影响。他开创的北宗文派和影响下的北方文风,伴随着元政权的南进,席卷

南方文坛,以致影响整个元代。《金末文风嬗变与元好问的散文审美理论》一文,勾勒出了金末文风发展变化的历程,又以翔实的文献资料为据,论述了元好问散文审美理论的形成以及内在构成,为金元之际中国北方文坛的散文走向和审美风尚,理出了头绪。《程钜夫江南求贤与元初南北文风融合》一文,从元初政治研究切入,通过对国家政权巩固运作中的一个举措——“江南求贤”的考查,就这一举措带来的南北文人互动,使长期政权分据而形成的南北两条文学潮流真正实现了全面地碰撞、交融和整合,及所产生的始料不及的文学效应做了全面探讨。将“江南求贤”定位为元代文学发展的转折和南北文风融合的标志,并对程钜夫作为南北文人交流的媒介及在整合过程中的作用和贡献,做了深入研究,从而论述了元代文学发展中的一个特殊的又是至关重要的现象。《马祖常散文的文化成因及审美特质》一文,则是元初南北文风合流之后,进入元代文学盛期、对一个极具代表性人物的散文研究。蒙古、色目诗文作家的群起,是这一时期中国文学史上的特殊现象,马祖常是这个群体中的佼佼者;马祖常又是继姚燧、元明善之后重要北方散文作家,在延祐、天历间的主流文坛上,与虞集等起着引风导向的作用。本文虽是个案研究,但对我们认识这一时期文坛的整体审美风尚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元末诗人叶颙生平与创作考论》一文,是对元末明初一个极具个性,又长期被近世学人所忽略的平民诗人的研究。

第二组四篇文章涉及金元佛、道两教中的几位诗文作家。《金末诗僧性英禅师考论》一文是对金元之交的一位著名诗僧——性英禅师的研究。性英早年随高宪学诗,金贞祐南渡后,先后与元好问、赵秉文、杨弘道、刘祁等朝野诸诗人往来唱酬;入元后又与耶律楚材父子、刘秉忠及金遗民诗人交往频繁,被元好问称为“无愧百年间”的一代诗僧。此人出万松行秀之门,先后出任洛阳龙门宝应寺、嵩山少林寺、大都仰山栖隐寺、大都归义寺等著名佛寺住持,与主释教事海云、国师那摩、少林福裕等共理蒙古时期佛教教务,曾参加宪宗戊午(1258)年的佛道大论战。被称为“百年耆旧,一代宗师”。但此人正史无传,《中州集》不收其诗及事迹。本文对其生平事迹、著述及其价值进行了全面论考。此文不仅有功于金元之际的文学研究,对佛学、史学也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元代南方道教正一道派中多诗人,而且名家迭出。如马臻、陈义高、吴全节、薛玄卿、朱思本、张雨等不下十余人,而有专集

传世者仅马臻、陈义高、朱思本、张雨四家。张雨《贞居先生诗集》颇多后人评述。其传本,且有后人拾遗整理。而马臻的《霞外诗集》、陈义高的《秋岩诗集》、朱思本的《贞一斋诗文稿》或散佚甚多,或后世复辑,实罕见其传。《元南方正一教道士马臻、陈义高、朱思本诗文集论考》一文就他们的诗文价值、板本源流、存佚得失,做了全面论考。其中朱思本不仅所著诗文具有较高价值,他还是一位杰出的地理学家和梵文翻译家。阮元《四库未收书目提要》认为,中国地图“计里开方之法,至思本而始备。”《元史·地理志·河源附录》讲到朱思本精通梵文,曾以“华文”译梵字地理图书。但这样一位很有成就的道士,因正史无传,其事迹又不见方志记载,至今已鲜为人知,《文学家兼地理学家的元代道士朱思本》一文,为学界起了烛幽探隐的作用。

第三组文章中《杨维桢的散文评价、文集版本及辑佚问题》、《杨维桢诗集、赋集版本流变考》二文是对元末东南文坛领袖杨维桢诗文别集的价值、版本流变、散佚拾辑诸问题的全面考察。《〈全元文〉中程文漏收文拾辑及生平著作考》与《〈全元文〉中宋禧漏收文拾辑及生平著作考》两文,是在《全元文》研究的基础上,所做的补遗补考。《全元文》中杨维桢文章的收集整理是下了功夫的,但树林仍辑得《葵对盾》文一篇,为《全元文》所未收。树林近年从《永乐大典》残卷及其它文献中补辑了《全元文》漏收文二百余篇,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收入本书的这两篇文章,就是他《全元文》补遗补考成果的一部分。《〈文章精义〉作者考辨》和《〈水东日记〉中一篇元人文论之作者悬案释疑》两篇文章,关涉元初一部文论著作和元末一篇元人文论的作者问题的考辨。《文章精义》是元代初年的一部重要文论著作。20世纪60年代初,郭绍虞、罗根泽两先生主编《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丛书,已收入此书。但本书作者的年代、名字、生平事迹等都存在悬而未决或意见多歧的问题。本文正本清源,以可信的资料和严谨的考证解决了学界的这些问题。明人叶盛《水东日记》中载有一篇上溯古文源流,全面论述有元一代古文作家个性风格的文论,自明代其作者就已失考,《〈水东日记〉中一篇元人文论之作者悬案释疑》据新发现资料证明此文乃为元末林希元所作。

最后一组文章为金、元两代诗文别集的汇考。金人著作不重刊刻,又痛遭金元易代兵火浩劫,旧编留世很少。《金人存世诗文集九种叙录》一文将王寂、丘处机、王庭筠、赵秉文、王若虚、李俊民、二段氏、

元好问等诗文集审其内容、考其版流、述其价值，汇于一编，一代别集文献，略备于此。树林对元人别集的考察则以地域分类，分别对杨奂、杨弘道、阎复、魏初、张之翰、刘敏中、元明善、张养浩、王结、李士瞻等蒙元北方十家，河南许衡、李术鲁翀、马祖常三家，江西程钜夫、周伯琦等七家，元中后期顾瑛等吴中五家，贡奎、贡师泰、余阙等安徽八家、两浙十二家诗文别集进行了系统考论，其学术价值大致可归纳四个方面：其一，所涉诗文别集，皆溯流探源，考镜其版本，就历代版抄间关系、得失，历代整理者的贡献，做了考证，为这些别集的全面整理奠定了基础。其二，对每家诗文的文学、文化价值都有精到的论述。有些如张之翰、魏初、刘敏中、贡师泰、周伯琦等，对元代文学的发展流变产生过重大影响，而今人多未注意，这些评论做了开拓性的工作。其三，在《全元文》的基础上，对一些诗文集集中的作品，进行了辨伪存真，查漏补缺的工作。如四库本杨弘道的《小亨集》，就查出此编误收杨载诗十七首，误收袁易诗一首，误收南宋刘宰文一篇，另从《永乐大典》中复辑得诗、文、词十二篇。并得出“明初内府所收《小亨集》十卷，已非作者本人编定，在元代近百年的流传中，已经窜入他人作品”的结论。再如对马臻今存汲古阁本《霞外诗集》进行研究，又自《永乐大典》中发现此本漏载诗十题十三首，自《诗渊》中发现漏载诗五十八题六十六首。其四，从地域文学角度，关照元代诗文文献，为不同地区的元代诗文研究指出了道路。

树林教授将十余年间有关金元诗文、文献研究的部分成果结集，希望得到学界和读者的批评、指正。我也希望这部著作能够得到朋友的关注，并期望他的后续研究能够按计划完成。

李修生

戊子年正月于北京懋堂

目 录

序一	邓绍基	1
序二	李修生	7
金末文风嬗变与元好问的散文审美理论		1
程钜夫江南求贤与元初南北文风融合		13
马祖常散文的文化成因及审美特质		34
元末诗人叶颙生平与创作考论		47
金末诗僧性英禅师考论		62
文学家兼地理学家的元代道士朱思本		85
元南方正一教道士马臻、陈义高、朱思本诗文集论考		94
杨维桢的散文评价、文集版本及辑佚问题		105
杨维桢诗集、赋集版本流变考		116
《全元文》中程文漏收文拾辑及生平著作考		127
《全元文》中宋禧漏收文拾辑及生平著作考		140
《文章精义》作者考辨		149
《水东日记》中一篇元人文论之作者悬案释疑		157
金人存世诗文集九种叙录		162
杨奂、杨弘道等蒙元北方十家文集考略		185
元代河南三先生文集叙考		209
元代江西程钜夫、周伯琦等七家诗文著作述考		218
元中后期顾瑛等吴中五家诗文集汇考		234
元中后期安徽贡奎、贡师泰、余阙等八家诗文集汇考		247

元代两浙十二家诗文集述考	268
--------------------	-----

后 记	296
-----------	-----

金末文风嬗变与元好问的 散文审美理论

元好问是金末元初文坛上的散文大家。郝经《遗山先生墓铭》云：“汴梁亡，故老皆尽，先生遂为一代宗匠，以文章独步几三十年，铭天下公德者尽趣其门。有例有法，有宗有趣。”^①《金史》本传说：“兵后，故老皆尽，好问蔚为一代宗工，四方碑版铭志尽趣其门。”^②《四库全书总目》也说：“好问才雄学赡，金元之际，屹然为文章大宗。”^③作为一位承上启下的划时代人物，他既是有金一代散文的集大成者，又是有元一代散文文风的开启者。但元好问由于诗名重于文名，历代评论家大都看重他的诗歌。本文试从金末散文风尚的嬗变，来考察元好问散文审美观的形成，以期对元好问散文在金代散文史上的集成作用作出梳理。

一、金末散文文风的嬗变

元好问集金末文坛各家所长，形成了自己的文章风格特点和审美观，被蒙元时期的文人尊崇和效法，这是前人的普遍看法。但元好问如何吸纳金末散文各家所长，而形成自己的散文审美理论的，还需要做深入探讨。要回答这一问题，必须对元好问散文审美思想的源头，即金末文风及其走向，有大致考察。

明清以来的评论家大都认为金代文学承北宋余绪，其实就对文体

①(元)郝经《陵川集》卷三五，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元)脱脱等《金史》卷一二六，中华书局，1975，第2742页。

③(清)永瑤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六，中华书局影印本，1965，第4121页下。

崇尚方面,却与北宋差别很大。唐代以降,一个时代的文风及文体崇尚,往往受科举取士影响,北宋四科取士,多重策、论,以此策论散文极为兴盛,导致大家辈出,甚者诗、词等韵文,也呈议论化、散文化倾向。金代虽仍以四科取士,但偏重律赋,最不重策、论。刘祁《归潜志》卷八记载:

金朝取士以词赋为重,故士人往往不暇读书,为他文。……故学者止工于律赋,问之他文,则懵然不知。间有登第后始读书为文者,诸名士是也。……吾尝记故老云:泰和间,有司考诗赋已定去取,及读策论,则止用笔点庙讳御名,且数字数与涂注之多寡。

正因如此,散体文于金元前期的近百年中,呈衰微趋势。虽然大定、明昌间,被号称“国朝文派”的蔡珪、党怀英、王寂诸人“卓然不愧为作者”,但仅是少数名士所为,并注意力多在诗歌方面。真正出现转机,是在贞祐南渡以后。当时“赵(秉文)、杨(云翼)诸公为有司(主持科举),方于策论中取人,故士风稍变,颇加意策论。”^①由于科举取士的导向,随之散文一体也兴盛起来。

南渡近二十年中,赵秉文、杨云翼、李屏山、雷渊、王若虚等人成为文坛的核心人物。但诸人中颇有两种不同的散文创作取向。作为金末文坛盟主的赵秉文,虽继明昌以来审美取向未变,为文多师法欧阳修、苏轼,但力排明昌以来的尖新浮艳之习,他在《竹溪先生文集引》中说:“亡宋百余年间,唯欧阳公之文不为尖新艰险之语,而有从容闲雅之态。丰而不余一言,约而不失一辞,使人读之者亹亹不厌。盖非务奇之为尚,而其势不得不然之为尚也。”他称赞党怀英的文章,“法以欧阳公之文,为得其正”^②;“文似欧阳公,不为尖新奇险之语”^③。他虽然崇尚欧、苏,但又主张转益多师,不拘一格。他说:“汉之文章温淳深厚,如折枯繇以为明堂之楹,驾驂驥以遵五达之衢,不忧倾覆,使人晓然知治道之归。韩文公之文汪洋大肆,如长江大河,浑浩运转,不见涯

①(金)刘祁《归潜志》卷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赵秉文《滏水集》卷一五,《丛书集成初编》本,第205页。

③《翰林学士承旨文献党公碑》,《滏水集》卷一一,第163页。